



宰相群体

与南宋孝宗朝政治

崔英超 著

南宋是权相辈出的时期，权臣政治是南宋政治的

一大特色。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并

且宰相的任用状况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此同时，孝

宗朝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前代的「新气象」，造就了

南宋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乾淳之治」。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NAN UNIVERSITY PRESS



宰相群体

与南宋孝宗朝政治

崔英超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宰相群体与南宋孝宗朝政治/崔英超著.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 - 7 - 5668 - 1068 - 7

I. ①宰… II. ①崔… III. ①政治人物—研究—中国—南宋 ②政治—研究—中国—南宋 IV. ①K827 = 4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5601 号

.....

宰相群体与南宋孝宗朝政治

著 者: 崔英超

责任编辑: 李 战 曹 军 黄少君 牛 攀

责任校对: 卢凯婷 周优绚 王嘉涵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7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42.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宋孝宗（1162—1188 年在位）可算是南宋最有作为的一个皇帝了。孝宗朝是南宋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宋孝宗锐意改革，力除弊政，起用主战派大臣，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企图有所作为，中兴宋朝，在南宋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然而，外部面临进入全盛的金朝世宗时期，宋军北伐失败，在 1164 年的“隆兴和议”签订后，对金战争结束，三十年未再有大战；内部则受到太上皇高宗的牵制，改革措施多受干扰，虽有和平的外交局面，但内政始终无大的起色，南宋趋向腐败的政治，终未能扭转。孝宗在晚年，待到太上皇死去，心灰意冷，终于决定步高宗后尘，禅位给儿子光宗，自己也去当太上皇了，可谓壮志未酬。

对于宋孝宗朝，已有不少人研究，但集中进行全面探讨的终属罕有。在吉林文史出版社组织编写的《宋帝列传》中，收有方如金、陈国灿所著《宋孝宗》，但尚显不足。因此，2002 年，在崔英超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我请她考虑一下宋孝宗朝。经过一番商讨，决定以“南宋孝宗朝宰相群体研究”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宋人有云：“国事成败在宰相。”通过对宰相群体的研究，正可以看出宋孝宗施政的倾向、用人的好恶，以及政策的贯彻执行。这些，正是考察孝宗朝政治必不可少的视角，也是少有人注意到的角度。由此，文章可写出新意，有所收获。崔英超的博士

论文，大致达到了我预想的深度，把握住了南宋孝宗朝政治运作的脉搏，达到了博士论文的水平。2004年，崔英超完成博士论文，并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历史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崔英超到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预科部任历史教师，教授外国学生及海外侨生。在此期间，崔博士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生育。随着儿子的出生，作为妈妈的崔英超，显然忙碌了许多。一眨眼间，几年过去，崔英超的儿子已经是小学生了，虽然教学任务亦十分繁重，但她总算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了，博士论文的修改提上了她的议事日程。经过修改的论文水平，显然比博士论文有了更大的提高，已成为一本较好的著作。十年后的今天，论文终于可以出版。我听闻此讯，亦为之高兴。希望这是崔英超完成生育大事后，在学术道路上的一个新起点，并在此基础上，争取更大的成绩。是为序。

张其凡

2014年5月1日于暨南花园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现状 /2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2

二、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3

第二节 材料的使用、研究的方法及本书的构想 /7

第二章 孝宗朝政治概况 /10

第一节 孝宗朝政治的演进 /11

一、隆兴政情 /11

二、乾淳之治 /33

第二节 孝宗朝的政治特点与时代风貌 /45

一、频繁换相，造成宰相势弱 /45

二、宠信近习，造成佞幸得势 /47

三、倡导务实、尚武之风 /51

第三章 孝宗朝宰相群体状况 /56

第一节 孝宗朝宰相群体之概况 /57

一、宰相情况一览表 /57

二、宰相群体状况分析 /60

第二节 孝宗朝宰相群体的类型分析 /61

一、以孝宗朝的政治阶段划分 /61

二、以对金的态度划分 /63

三、以对理学的态度划分 /64

四、以罢相的原因划分 /65

五、以与近习的关系划分 /66

2 宰相群体与南宋孝宗朝政治

六、以宰相的籍贯、出身、年龄划分 /66

七、以任期长短划分 /68

八、以门人、同年划分 /69

第三节 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70

一、相不久任 /70

二、不次拔相 /73

三、长期缺相 /74

四、用而受制 /75

第四章 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对外关系 /80

第一节 孝宗朝对外路线、方针的转变 /81

一、崇岳贬秦，振作人心 /81

二、倡导文武并用，提高武人地位 /85

第二节 宰相群体与对外军事的发展 /89

一、主战派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军事 /89

二、主守派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军事 /116

三、主和派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军事 /126

第三节 孝宗朝宰相对宋金外交的影响 /134

一、孝宗朝宰相对外交礼仪的影响 /134

二、孝宗朝宰相与战后对金外交 /145

第五章 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对内政治 /162

第一节 孝宗朝宰相群体与法制 /163

一、孝宗朝君臣对法制的重视 /163

二、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法制建设 /170

三、孝宗朝君臣重视法制建设的意义 /174

第二节 孝宗朝宰相群体与朋党 /175

一、宰相群体与孝宗朝朋党状况 /175

二、宰相群体与道学党、反道学党的形成 /181

第三节 孝宗朝宰相群体与近习 /200

第四节 孝宗朝宰相群体与皇权运作 /210

一、三省制与宋代的中枢权力运作 /211

二、南宋高宗朝之皇权运作 /213

三、孝宗朝皇权运作之特点及宰相群体之应对 /215

四、孝宗朝中枢权力运作之政治影响 /221

第五节 孝宗朝皇权与相权状况及君相关系 /223

一、强势却不乏理性的皇权 /223

二、受制却不低迷、势弱却又责重的相权 /232

第六章 结 语 /240

附 录 /248

参考文献 /25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现状

一、研究目的和意义

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体制中，宰相作为中央权力的核心成员，历来位极人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宰相群体则更是一个地位尊崇，往来于帝王、显宦与名士之间，且对一个时代的政治面貌、特色与发展走向有着深远影响的社会群体。在宋代这一特殊的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历史转型期，宰相群体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及影响更加重要。宋代，宰相之名几经变更。北宋之初，沿用唐制，以同平章事为宰相；神宗元丰改制，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宰相；宋徽宗政和年间，设左辅、右弼、太宰、少宰为宰相，仍兼两省侍郎。靖康中曾复改为左右仆射；南宋高宗建炎三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丞相之职；孝宗朝乾道八年二月以后改为左右丞相。关于宋代宰相之职权，据《宋史·职官志》记载：“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本书即以南宋孝宗朝宰相群体为研究对象。南宋是权相辈出的时期，权臣政治是南宋政治的一大特色。而孝宗朝却是南宋时期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并且宰相的任用状况呈现出新的特征。与此同时，孝宗朝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前代的“新气象”，造就了南宋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乾淳之治”的局面。因此，本书所要探讨的是在孝宗朝，这一南宋社会由动荡、粗安到平稳发展，且呈蒸蒸日上之势，国家政策逐渐由对外转向对内的转型时期，作为权力中枢的宰相群体的特点，以及该群体在孝宗朝对外关系和对内政治中的作用及影响。本书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对孝宗朝政治状况与宰相群体状况的分析和考察，进而论述孝宗朝不同的宰相群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针对不同政治问题所产生的作用及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宰相群体对孝宗朝政治面貌、特点及发展趋势的深刻影响。

以往关于孝宗朝的研究多从单个人物的角度进行考察，着重对宋孝宗及孝宗朝的某些著名人物进行研究，此外就是针对孝宗朝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一些概论。本书则从孝宗朝宰相个人、群体的角度出发，对其与孝宗皇帝、孝宗朝内外政治的发展进行互动考察。另外，孝宗朝有些宰相如叶颙、蒋芾、梁克家、曾怀、叶衡、赵雄等人，以前很少或根本没有对他们的研究，本书则较为具体详细地考察了他们在国内外政治中的影响。此外，通过对孝宗朝全体宰相进行群体研究，从而反映该朝内外政治的特点与发展走向，这在学界尚属新的尝试。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从对孝宗朝宰相群体的研究中，不但揭示出孝宗朝对于高宗朝政治的反动倾向，以及其在实践中的成败，而且揭示出孝宗朝政治乃至南宋前期政治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的内在原因，从而对孝宗朝“乾淳之治”局面的出现做出了诠释，即对外虽北伐不成而达成和议，但却显示出一种主动的、积极进取的态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宋朝的军事、外交地位。对内则实现了稳定的局面，使一度遭到破坏的士大夫政治体制得以恢复和重建，从而使孝宗朝的政治达到了一种较为清明而向上的局面，为孝宗朝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因此，本书对于研究孝宗朝乃至南宋中后期政治发展的趋势，对于深入了解南宋时期“士大夫”政治、南宋权臣政治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这也是本书写作的意义所在。

二、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孝宗朝宰相群体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过去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体现了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以宋孝宗为中心来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状况。如：方如金、陈国灿《宋帝列传·宋孝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王德毅《宋孝宗及其时代》（台湾《宋史研究集》第十辑），柳立言《南宋政治初探——高宗阴影下的孝宗》（台湾原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3分，1986年）、《宋孝宗与三教合一》（《大陆杂志》，78/4，1989年4月第35页）、“The Absolutist Reign of Sung Hsiao-tsung (r. 1163—1189)”（Ph. 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6, 92—106；

133—141),王德忠《孝宗加强专制集权浅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宋孝宗“恢复”图治述评》(《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和《金世宗与宋孝宗之比较研究》(《史学月刊》1999年第6期),朱学山《宋孝宗的内政建设》(暨南大学古籍所刊《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二辑),范有芳《宋孝宗为改变不平等“受书礼”的斗争》(《松辽学刊》1997年第1期),陈晓莹《宋孝宗治国政策与成效之评析》(《甘肃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方如金《试评宋孝宗的统治》(《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王曾瑜《宋孝宗时的佞幸政治》(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张邦炜《宋孝宗简论》(《天府新论》1991年第3期),庄练《中国历史上最孝顺的皇帝——宋孝宗孝行无双》(《文坛》1983年4月第274期,第63~64页)等。这些论著与论文从不同方面对宋孝宗的治国方略、统治得失做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论述和探讨。

其二,对孝宗朝宰相人物的个案研究较多,而对宰相群体性的研究则非常缺乏,甚至是空白。如:陈乐素《读〈宋史·魏杞传〉》(《求是集》第二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版),柳定生《张浚与虞允文》(《文史杂志》1942年4月第2卷第4期),元祐《南宋抗金英雄张浚》(成都晚报1963年2月7日),夏顺均《虞允文的一生》(《历史知识》1983年第2期),杨德泉《张浚事迹述评》(《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魏隽如《关于张浚的评价问题》(《历史教学》1990年第12期),蒋义斌《史浩与宋孝宗朝政局——兼论孝宗之不久相》(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82年第14期),俞倍芳《鄞籍中兴宰相史浩二三事》(《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何忠礼《从对张浚和史浩的评价看民族心理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杨渭生《徐规教授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诸葛忆兵《老成谋国的南宋宰相史浩》(《文史知识》1999年第11期),王曾瑜《汤思退与隆兴和议》(《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林叶秦《南宋二相陈俊卿、陈文龙亲缘考》(《纪年研考》1995年第6期),王德忠《张浚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蔡哲修《张浚与川陕的经略(1129—1133)——“南宋偏安局面的形成”研究之二》(《大陆杂志》,1/99,1999年7月第13~30页),雷大受《忠诚卫国、勇荷重任的虞允文》(《文史知识》1982年第9期),刘诗《谈宋

代虞允文的墨迹〈适造帖〉》(《四川文物》1994年第4期),林建曾《采石之战及其指挥者虞允文》(《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施平《虞允文采石破金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5年第4期),周生春《虞允文晚年事迹述论》(《岳飞研究》1996年第4辑),童向飞《尹焞、陈亮、吕祖谦、朱嘉、周必大等与韩元吉交游考略》(《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这些文章对孝宗朝的个别宰相从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其三,对孝宗朝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的概论。如: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版),寺地遵著,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稻禾出版社1995年7月版),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7月版),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11年7月版),张其凡《两宋历史文化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版),周生春《十二世纪七十年代的宋金关系》(《岳飞研究》1992年第3辑),范立舟《乾道、淳熙年间朝野对理学的批评》(《暨南学报》2000年第7期),何忠礼《“绍兴和议”签订以后的南宋政治》(《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9期)、《试论南宋孝宗朝初年与金人的和战——兼论对张浚和史浩的评价》(《浙江学刊》1998年第6期),黄山松《南宋的和战之论与“规模”说》(《浙江学刊》1996年第4期),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唐自斌《试论南宋封建法制的败坏及原因》(《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陈寒鸣《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及启示》(《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虞云国《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学术月刊》1995年第11期),朱宁《南宋新迹象及其结果》(《光明日报》1999年11月),李华瑞《两宋改革的特点及其历史作用》(《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王瑞来《论宋代皇权》(《历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与《论宋代相权》(《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倪士毅《宋代宰相出身和任期的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罗家祥《试论两宋党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俞兆鹏《论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兼论朱熹的政治思想》(《江西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史继刚《宋代宰执的谒禁制度》(《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陈丽《南宋理学官学化原因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

3期),陈国灿《南宋反理学思潮的理论总结者——叶适》(《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诸葛忆兵《宋代相权强化原因探析》(《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郑强胜《宋代吏风初探》(《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河南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刘庆、毛元佑《中国宋辽金夏军事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黄宽重《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7月版),赵绍铭《中国宋辽金夏政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版),赵晓耕《宋代法制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任崇岳《隆兴和议新论》(《中州学刊》1991年第1期),西岳《从采石之战到隆兴和议》(《史学月刊》1958年第6期),杜文玉《“隆兴北伐”的几个问题》(《宁夏教育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殷维雄《宋金和战始末及其影响》(《史学通讯》1986年第22期),张博泉《宋金和战史论》(《史学集刊》1984年第2期),董克昌《采石之战新论》(《北方论丛》1993年第4期),郑昌淦《隆兴和议前后的战与和》(《文史知识》1982年第9期),蒙文通《从采石瓜洲毙亮记认识到宋代野史中的新闻报导》(《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第2期),刘肃勇、王晓莉《论完颜亮南征伐宋的战争》(《求是学刊》1987年第5期),许国《宋金关系浅析》(《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董克昌《宋金外交往来初探》(《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2期),赵永春《宋金交聘制度述论》(《辽金史论集》1989年第4期)、《关于宋金交聘“国书”的斗争》(《北方文物》1992年第2期)、《宋金关于“受书礼”的斗争》(《民族研究》1993年第6期)、《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程定飞《宋代皇帝的内禅》(《历史教学月刊》1996年第2期),龚延明《宋代的皇帝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何忠礼《略论宋代士大夫的法制观念》(《浙江学刊》1996年第1期),王志强《南宋司法裁判中的价值取向——南宋书判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唐自斌《试论南宋封建法制的败坏及原因》(《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李家骥《南宋和战与党争商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陈丽《庆元党禁及其起因探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倪士毅《宋代宰相出身和任期的研究》(《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

4期), 张伟《也论宋代相权》(《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梁天锡《南宋宰辅带衔编修制度》(《史学汇刊》1983年第12期), 虞云国《宋代台谏系统的破坏与君权相权之关系》(《学术月刊》1995年第11期), 贾玉英《台谏与宋代权臣当政》(《河南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诸葛忆兵《宋代宰相制度、职权述略》(《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 龚延明《宋代“中书”刍议》(《杭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郝若贝(美)撰、邓小南译《对于中国宋代官僚派别活动的新探讨: 一种假说》(《宋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1期), 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暨南学报》2001年第6期), 余贵林《宋代士大夫的心态与行为》(《中州学刊》1993年第2期), 郭学信《时代迁易与宋代士大夫的观念改变》(《文史哲》2000年第3期), 唐任伍《论宋代知识分子的地位》(《松辽学刊》1987年第2期)等。这些论著与论文都论及了孝宗朝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状况, 对本研究课题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帮助和参考。

第二节 材料的使用、研究的方法及本书的构想

要研究孝宗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宰相群体对内外政治的作用和影响, 就必须有大量的史料作为佐证。有关孝宗朝宰相个人的各种材料非常多, 如何取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反复权衡的基础上, 笔者决定以具有代表性和一般共性的史料为根据来分析宰相群体的基本政治行为, 以具有特殊性的史料为根据来解析一部分宰相特殊的政治影响力。而本书所指的代表性和一般共性的史料, 为宋代(尤其是南宋)正史、政书和官箴等; 特殊和非共性的史料, 为南宋人的文集、笔记、地方志、年谱和碑传等。总体来说, 可资引用和借鉴的资料共分三类, 即古代文献史料、今人的论文及论著等。(详见附录)

本书采用了个案研究与群体研究交互使用, 同时将历史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方法贯穿其中的研究方法。

本书除了绪论和结语两章外, 正文主体部分共有四章。

第二章题为“孝宗朝政治概况”，分两节进行论述。第一节是孝宗朝政治的演进。本节分隆兴政情（隆兴和战）、乾淳之治两个阶段，详细论述了整个孝宗朝内、外政治发展、演变的总体情况。第二节是孝宗朝的政治特点与时代风貌。本节分频繁换相，造成宰相势弱；宠信近习，造成佞幸得势；倡导务实、尚武之风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从而对孝宗朝的政治特点与表现出来的新气象有一个总体的概括。

第三章题为“孝宗朝宰相群体状况”，分为三节。第一节谈孝宗朝宰相群体之概况，从诸多方面叙述了宰相群体的总体概况，并将宰相们的各种情况用表格的方式表现出来，一目了然。第二节是对孝宗朝宰相群体的类型分析，即按照不同的标准将宰相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而着重论述与本书相关的几种分类，如：按政治阶段分；按对金的不同态度分为主战、主和、主守三派；按对理学的态度分为倡导者和反对者；按宰相罢免与皇权的关系分为健康原因自行辞职者、才能不足罢相者、忤逆上意而被罢免者、权势日隆威胁皇权而被罢免者；按对近习的态度分攀附者、中间徘徊者与坚决反对者。此外，还有按宰相籍贯分、按任相长短分等等。第三节是宋孝宗的用相方略，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宋孝宗的用相特点。

第四章题为“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对外关系”，分为三节。第一节谈孝宗朝对外路线、方针的转变，从崇岳贬秦、振作人心和倡导文武并用，提高武人地位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从而表明了孝宗朝在对外关系上的新气象。第二节谈宰相群体与对外军事的发展，分主战派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军事，主守派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军事，主和派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军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本节着重论述了主战派宰相群体对孝宗朝军事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从而对孝宗朝对外军事的成败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对于主守派宰相群体对军事的影响亦有充分的论述。第三节谈孝宗朝宰相相对宋金外交的影响，首先论述了孝宗朝宰相对外交礼仪的影响，其次论述了孝宗朝宰相与战后对金外交。两部分都从战、守、和三派的角度加以论述，从而对三派在孝宗朝外交中的作用和影响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第五章题为“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对内政治”，分为五节。第一节谈宰相群体与孝宗朝法制建设的关系，本节分三部分论述了孝宗朝君臣对法制的重视、宰相群体与孝宗朝的法制建设以及孝宗朝君臣重视法制建设的意义；第二节谈宰相群体与朋党的关系，首先论述了宰相群体与孝宗朝朋

党状况，分析了孝宗朝朋党的概况和宰相群体与朋党的关系，其次论述了孝宗朝晚期宰相群体与道学党、反道学党形成的关系，分析了孝宗朝宰相群体与理学及理学家的往来关系以及道学与反道学党派的形成及其斗争；第三节谈宰相群体与近习的关系，首先回顾了孝宗朝近习势力的概况，然后分析了对近习势力采取不同态度的三类宰相群体与近习的关系，着重探讨了大多数宰相对近习势力的斗争，即“宫府相争”的情况；第四节谈孝宗朝宰相群体与皇权运作，本节首先回顾了“三省制”与宋代的中枢权力运作的情况以及前朝高宗朝的皇权运作特点，然后重点分析了孝宗朝皇权运作的特点及宰相群体的应对，最后总结了孝宗朝中枢权力运作的政治影响；第五节分两部分谈孝宗朝皇权与相权的状况及君相之间的关系。

第六章为结语，总结了宰相群体与孝宗朝政治发展状况以及其对国家政策由对外转向内政建设的政治走向的影响，从而阐明了宰相群体与孝宗朝士大夫政治体制的重建与“乾淳之治”局面产生的重要作用。该章是对全篇写作意旨的总结和概括，从而使本书的论述观点更为突出和鲜明，使全书的主旨有一个提高和升华。